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

重逢社会

陈心想 著

RE-IDENTIFYING SOCIET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

重逢社会

RE-IDENTIFYING SOCIETY

陈心想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逢社会 / 陈心想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6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

ISBN 978-7-5201-4845-0

I. ①重… II. ①陈… III. ①社会学-中国-文集
IV. ①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9088 号

·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 ·
重逢社会

著 者 / 陈心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4845-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陈心想

1975年生，河南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曾在美国高校学习工作近18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麦克阿瑟学者奖学金，社会学系优秀研究生助教奖、马丁德尔奖等。

出版专著《明尼苏达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三只眼睛看教育》(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让教育多一点理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走出乡土》(三联书店，2017)等。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书目

老年健康及其寿命——基于社会学的研究 / 焦开山 著

社会分层研究：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 / 秦广强 著

重逢社会 / 陈心想 著

君往何处？——国际人才外流与国家发展 / 田方萌 著



装帧设计

社科文献设计中心

Telephone

010-59367109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编委会

主任：麻国庆

委员：麻国庆 郭伟和 罗惠翹 时立荣 陈俊杰 陈心想 良警宇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 工作丛书”总序

中央民族大学有着深厚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传统。20世纪5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有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学术大师汇聚于此，在中国学界形成一个以少数民族调查和研究为核心的社会学的高峰时期。在很多研究者看来，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被取消以后，中国社会学就消失了，直到1979年恢复。其实不然，在此期间，相当多的社会学家从原来的汉族研究转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并没有停止，只是活跃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从事调查和研究。记得李亦园先生在北京大学“潘光旦纪念讲座”上，提到1949年前以“燕京学派”为代表的主要从事汉族研究的“北派”和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南派”，两派在1949年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派”转向了少数民族的研究，而“南派”到台湾后转向了汉族社会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北派”的重镇转移到了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可以说在1979年社会学以学科的名义恢复前，中央民大的学者们一直延续着这一传统，同时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纳入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研究之中。虽然当时取消了社会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但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火种却以新中国民族研究为载体得以保存。1978年，受中央委托，胡乔木同志找到时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费孝通恢复社会学学科，费先生积极联系、多方奔走，恢复了中国社会学。后来费先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社会学研究所，又到北京大学创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把中国社会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央民族大学曾经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火种传递者。

1979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从学科意义上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突出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的学科建设，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相对较晚。学术团

队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自 21 世纪以来获得较快的发展，2000 年在新合并成立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学院创建了社会学系，之后不断成长壮大，形成了民大社会学学术共同体。2001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2005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创系以来，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注重社会学古典理论和研究传统的传承，吸收当代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围绕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等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努力促进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构建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研究特色，逐渐形成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的学术脉络和学术意识直承前贤、薪火相传，结合民大的学科定位与优势，本着“从实求知，美美与共”的学术传统，锻造着一支逐渐强大的学术队伍，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独特的贡献。在民大社会学这种令人鼓舞的学术氛围中，学术团队里每位成员都扎扎实实，勤恳耕耘在“学术的田野”中，优秀成果不断涌现。阶段性成果通常是以论文或者单篇文章的形式呈现。在学术成果的展示方面，论文固然重要，但由于篇幅所限，难以详尽地表达应有的内容，故而以厚重的书籍的方式来整体汇报研究所得有其独特的优势。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传统就从博士生阶段培养学生写书。费孝通先生曾回忆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帕克教授到燕京大学给他们上课，开坛就讲他是来教他们如何写书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是继承和鼓舞这个“写书”的传统，把优秀的社会学成果以图书形式推向学术界。特别是要把“社会”这个无字之书，写成“有字”之书，需要一个知识的生产过程。

当前我国进入现代化转型的快速发展期，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深层次的问题。这里既有现代化转型的一般趋势和问题，又有中国特色的具体条件和道路产生的新经验、新情况。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社会学去研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比较严重，而“胡焕庸线”以西仍然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学需要研究中国社会不均衡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民族差异之间的关

系问题，为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目标，让每一个民族都不落下而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年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人为了中国的边疆学和边政问题，采取社区为本的研究策略，开创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迈出了经验研究的坚实步伐。今天中国社会学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转型问题，尤其是面对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和新的民族关系问题，仍然需要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我们一方面需要坚定不移地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发扬社会学研究的实证精神和田野方法，来扩展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认识 and 把握，产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在全球化背景下，“流动”会变成全球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全球化和地方化的问题，人类学家做了很多努力，社会学家在全球社会学的视野下，如何突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外国人研究，这些国际大都市的国际移民问题可以回应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关系。人口的流动现象反映了全球体系在中国如何表述的问题。所以萧凤霞教授认为中国研究仍旧是一个过程问题。在一个全球流动和开放的时代，大批中国公民迈出国门走到世界各地，也有大批外国人来到中国从事贸易、求学和旅游，也可能定居下来，出现韩国城、非洲角等新的族群。不管是中国的海外华侨融入当地的生活问题，还是在中国的外国人融入中国社会生活问题，都需要社会学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研究团队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段历程，这个团队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实际参与者，是中国社会学的重镇之一。借助民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力量，中央民大社会学学术共同体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和学科优势。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科的关系这样总结：“多科并存，互相交叉，各得其所，继续发展。”民大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共存并进行着“互相交叉”，而后取其所需，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

本丛书希望在构建中国社会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在把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科打通的基础上，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术同仁

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生产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用的知识，借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丛书”的平台不断地呈现给大家。也希望海内外学术机构和学术同仁给我们支持和帮助，督促我们学术共同体的进步，更多地出版学术精品，助力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麻国庆

2019年5月25日

在日常中体悟社会学（代序）

2018年12月初，心想来电话，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写序。按照我的理解，序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为人作序，起码要满足三个条件：年高、德劭、学养深厚。尽管论资历我算是心想的学兄，但到底是同一辈人。总之，论辈分，论学养，都轮不到我来作序，比我有资格的学界前辈太多了。但心想十分谦虚和诚恳，既然如此，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算是代序吧。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只比心想高三个年级，而且住在同一栋楼里，所以来往比较多。后来他去美国留学，相互接触就少了，但毕竟都在社会学界，所以仍能不时从各种渠道听到他的好消息。在我的印象中，心想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村孩子，性格有些腼腆，但博闻多识、好学深思，尤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学理。他在研究生期间就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以老家的一桩调田风波为案例，剖析社会规则的破坏与重建。从心想后来陆续出版的《明尼苏达札记》《第三只眼睛看教育》《让教育多一点理想》，加上目前让我作序的《重逢社会》来看，他始终保持这样一种风格。

我十分欣赏这种风格，近年来也在努力提倡这种风格。我之所以欣赏和提倡这种风格，是因为从学理上说，任何关于社会的理论都是从观察和理解日常生活开始的。尽管资料的剔抉爬梳，以及理论的提炼和概括都离不开书斋功夫，但从根本上说，理论来源于日常生活。离开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和体悟，理论就缺乏洞察力，从而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应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似乎是很显明的道理，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兴起“研究规范化”思潮。规范化的内容之一，便是强调科学知识的累进性。根据这一要求，任何研究都

不能脱离以往的研究脉络自说自话，而必须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进行。为此，每个研究必须系统地、深入地梳理以往研究的得失，然后在反思和吸纳既有知识的基础上提出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只有这样，科学研究才能避免重复、浪费和倒退，真正做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学也逐渐摆脱早期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内容上越来越严谨，在形式上越来越精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人说，社会学目前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中除经济学之外科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这样一种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研究规范化”运动所赐。

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学中也滋生着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在规范化的名义下单纯重视与既有的理论对话，而忽视与现实的生活对话。诚然，加强与既有研究成果的对话是社会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必由之路，对新生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尤其如此。但也要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而社会是人的创造物，不同时代的人们基于不同的价值和认知，在不同条件下创造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随着时代和文化而有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与此同时，基于不同的价值、认知和条件，同样是研究社会，不同时代和文化的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 and 理论思考的方向也是不同的。上述两个方面单独或共同地决定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总是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文化性。提示注意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性和文化性，并不意味着否认社会科学的科学属性。因为任何理论的成立都是有条件的，特定的时代和文化可能就构成某理论赖以成立的条件之一，而且任何研究者对理论的探索都会受所处时代和文化的影响，从而表现出某种局限。在这个意义上，注意时代和文化的差异，非但不会妨碍对科学原理的探索，反而有助于澄清科学原理的适用条件，不断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社会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在发展过程中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成果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阶段，社会发展很快而社会学研究相对滞后，引进和吸收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规范化”运动可谓厥功至伟：首先，它使有意识地吸收先进研究成果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学术规范，在该规范的约束下，任何人都不能再自恃才高而闭门造车，否则在学界就是自取灭亡；其次，它也使吸收先进研究成果的工作变得更加深入、系统和连

续，不再像以前那样凭着研究者个人的兴趣和见识而予取予夺，而是必须接受同界同仁的检视。就这样，一方面是助力，另一方面是压力，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吸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快，都要全面。这也是中国社会学能够迅速摆脱草莽状态，在科学化道路上大踏步迈进的重要原因。

然而，西方社会学研究再高明，毕竟也是西方文化在特定时代的产物，且不论其中许多理论和方法都是以西方社会为原型，即使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渗透着西方的关切和视角。这就要求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学成果时充分注意中西方在文化和时代上的差异。然而，现在确有不少研究忽视甚至鄙视这个问题。我曾经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限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一位“海归”青年教师发言，讲中国的环境问题。让众人目瞪口呆的是，她居然花了差不多13分钟来论证“为什么是中国”，即为什么要研究中国而不是别国的环境问题，后来在主持人的好心提醒下才匆匆转入正题，最后因为时间不够而草草结束。天呐！如果你是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的会议上，或者是面对美国人发言，“为什么是中国”可能需要论证一下，但你是中国人研究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会议上面对中国人发言，有什么需要论证的？这个“问题意识”也太奇怪了！简直就是把美国或美国人的问题意识直接搬到中国来。也许她发言的PPT是为美国会议或美国听众准备的，但如果对文化差异以及因此而来的问题意识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受过博士教育的“海归”，临场改变一下也不至于那么难吧？说到底，还是对问题意识背后的文化差异不敏感，可见食洋不化到了什么程度。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

大体说来，一是有人认为，科学就意味着普遍真理，普遍真理是不存在时代和文化差异的，因此科学研究对时代和文化差异不予考虑。如前所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普遍真理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成立是无条件的；恰恰相反，理论的成立总是有条件的，而时代和文化可能就构成特定理论成立的条件。更何况，一个理论是不是普遍真理，需要不断地接受各种事实，包括来自不同时代和文化的事实检验。

二是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当作科学研究的中心，而完全把中国视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于是在选题和论述上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对西方研究成果背后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缺乏反思的能力和兴趣。应该说，在当前

西强我弱的世界格局下，这种立场在国内还是很有市场的。

三是对研究规范化的高度推崇，使理论对话逐渐成为一种仪式，重形式而轻内容的研究套路也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毋庸讳言，许多问题、理论、方法和模型尽管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但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或需要，或者说，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将这些问题、理论、方法和模型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结合起来。然而，在十分讲究学术渊源和脉络的研究范式下，一个研究仅是将中国问题置于这些理论背景中去展开理论对话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获得足够高的学术合法性，从而获得不错的发表和待遇。在这种情况下，不问可知，又有几个人愿意“没事找事”，肯花工夫去反思和修正既有的研究呢？尤其是在当前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强调发表数量和国际发表的环境下，去挑战已然具有某种“神圣性”的西方问题、理论、方法和模型，更是吃力不讨好。

不管是什么原因，最终结果都是单纯追求研究的规范性而轻忽实际生活。尽管如此，这样的研究因其显得庄严、富有书卷气，在这个被许多人目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中仍然颇受欢迎。然而，这些终究都是纸面繁华。古训“道不远人”的另一层含义，是道必须服务于普罗大众的生活，不能沦为少数人孤芳自赏的雅事。中国社会学如果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而沉迷于从西方学术脉络中寻找问题，去演绎所谓学问，无异于主动抛弃中国社会。作为中国的社会学而抛弃中国社会，最终也一定会被中国社会抛弃。被中国社会抛弃的社会学，还算是中国社会学吗？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引起举世瞩目之际，许多研究却对中国社会转型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实在是太脱离时代。

要切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回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关注每时每刻在发生的、每时每刻在变化的日常生活，从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去寻找社会学研究的素材和想象力。借助日常生活的活力，理论思维才不至于僵化，理论胸怀才不至于封闭。这一点心想学弟做到了。纵览他的这部作品，许多篇章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人、一事或一物入手展开社会学之思，观察细腻，论述深刻、亲切，语言清新、活泼，读来兴趣盎然而富于启迪。可谓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方寸之间别有天地。

写这种文章，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日常生活就在我们身边，人人都可自称熟悉，但正因为熟悉，所以容易习焉不察。要能于平中见异，

做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非有不凡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只有理论功底深厚，才能“众人皆醉我独醒”，于不疑处有疑，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再则，日常生活是流动的、枝蔓的，不像理论模型所表示的那般规范和严整，这就存在一个如何将抽象的生硬的理论模型与具体的鲜活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的问题。对理论参悟不够透彻，不能很好地理论联系实际，生搬硬套是写不出这种文章的。然后，语言能力也很重要。谈理论而不晦涩，谈日常而不轻浮，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既需要学术修养，也需要心性修为。在这三个方面，心想学弟都有不俗的表现，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最后，可能需要补白的是，我并不否定规范性对于社会学研究以及整个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倡行学术规范，对于学界同仁全面、深入、连续地吸收先进研究成果，薪火相传地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已经发挥并且仍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意义不容否定。科学的任务是对世界做出尽可能周密而简洁的解释。而解读是解释的基础，离开对日常生活的解读，理论解释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过来，科学也不能停留在解读的层次上。而要把鲜活但离散的解读上升为周密而简洁的解释，不尊重、不遵循一定的科学规范是绝对不行的。正如哲学家库恩指出的，科学的革命就是范式的革命，先有范式然后才有革命，范式能够保证科学的常规发展，为科学革命的到来创造前提和条件。

概括起来，我想说的是，不要让规范窒息了生命，不要让形式高于内容；只有形式与内容、规范与实质、解读与解释相辅相成，学术之树才能长青。“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日常生活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源头活水，社会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日常生活之水的浇灌。

冯仕政

自序

我们都是时光里的移民

一

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时 16 岁。已过不惑之年回顾这些年里辗转南北东西负笈海外留学工作，有一种感触说不出来。曾一次在旅店夜宿，想起自己的一些社会学杂文，欲搜集起来出版一本文集，该取何名？辗转反侧，忽然想到一个名字，即“重逢社会”。重逢是指空间上遇到了一个不同的社会，比如小时候的那个春天油菜花开满地，麦浪如海的乡村，与当下所在的身边到处麦当劳肯德基店的美国南部小城，虽然人在社会之中，但遇到的已非面目一样的社会。在时间的意义上而言，重逢社会是指穿越时间的隧道，我们一天天不知不觉中在变化了的社会里生活。我们既是空间的移民，也是时间的移民。

我的那些杂文不就是在不同时空下对社会感受的描述和分析吗？以时空不同的组合，我们一再地与“社会”重逢，但对重逢的“社会”也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方知变迁已在其中矣。世界大流动的背景下，中国也在走出乡土，我们的社会历经沧桑，旧面目中多了诸多新颜。这也正是认识当下中国社会最需要着力的地方，哪些变了，哪些没变，从社会结构到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逻辑，都需要做一番检讨。

海外留学工作十几年里，不知多少次与“社会”重逢，不管哪次从中国返回美国，还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甚或在一个国家里旅行，所到之处皆“社会”，然而如同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每次相逢皆非同一个“社会”。看似相同，实则已有多多少少的改变。与社会重逢就像再次相遇旧相识，有一种说不出的欣喜与伤感交织的情愫。

二

巴基斯坦作家莫欣·哈米德（Mohsin Hamid）2017年出版了一本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一路向西》（*Exit West*，也有人译为《出走西方》），成了《纽约时报》年度十佳畅销书，也上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喜爱的书单。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在时空流转中的移民和难民。书里有一句金句：我们都是时光里的移民（We are all migrants through time）。

《一路向西》讲述的故事从一个没有具体年代，也没有具体国度的城市讲起，如同《红楼梦》的“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一样，但所讲故事，如同当下世界正在发生，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些年的叙利亚等国的难民。

在那个时间地点无考的城市里，两个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在夜校里相识了。男生 Saeed 有点传统而腼腆，女生 Nadia 大胆而勇敢。内战的爆发改变了原本理所当然的生活，生命没有了保障。于是，他们通过神秘之“门”，开始了一路向西的难民生活。这种神秘的“门”是魔幻的关键。

他们到了希腊的 Mykonos 岛，又到了伦敦，住在被栅栏围起来的难民营，看到了当地人与外来移民和难民的矛盾与冲突、打架与斗殴，后来两人又来到了美国旧金山北边 Sausalito。通过神秘之“门”一路向西，一路上充满恐惧、悲伤、希望、绝望、疲惫以及渐行渐远的情感。

作者哈米德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故事讲述方法，在 Saeed 和 Nadia 两人漫长的逃难过程中，作者另外铺设了一条线索，把环球不同地点的各色人等放了进去，核心都是生活与移民或者难民有关。比如在澳大利亚的某个夜晚独自开窗睡觉的女子，墨西哥靠近加州边境的一个孤儿院里的“妈妈”，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个独自喝酒的耄耋老人，摩洛哥某地不肯跟随女儿离开家乡的寡妇，等等。

书里有一句大概有类似移民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感的话：离开成长的地方之时，就等于谋杀了留在成长地方的亲人。

我还记得童年时代，家乡有迁民政策，男孩多的家庭往往被布置了任务，要迁走一家，到数千里之外定居。目睹过就要迁走时移民者与亲人之间的悲伤离别。这种迁民还是有目的地的、有安排的，有生活经济补助，